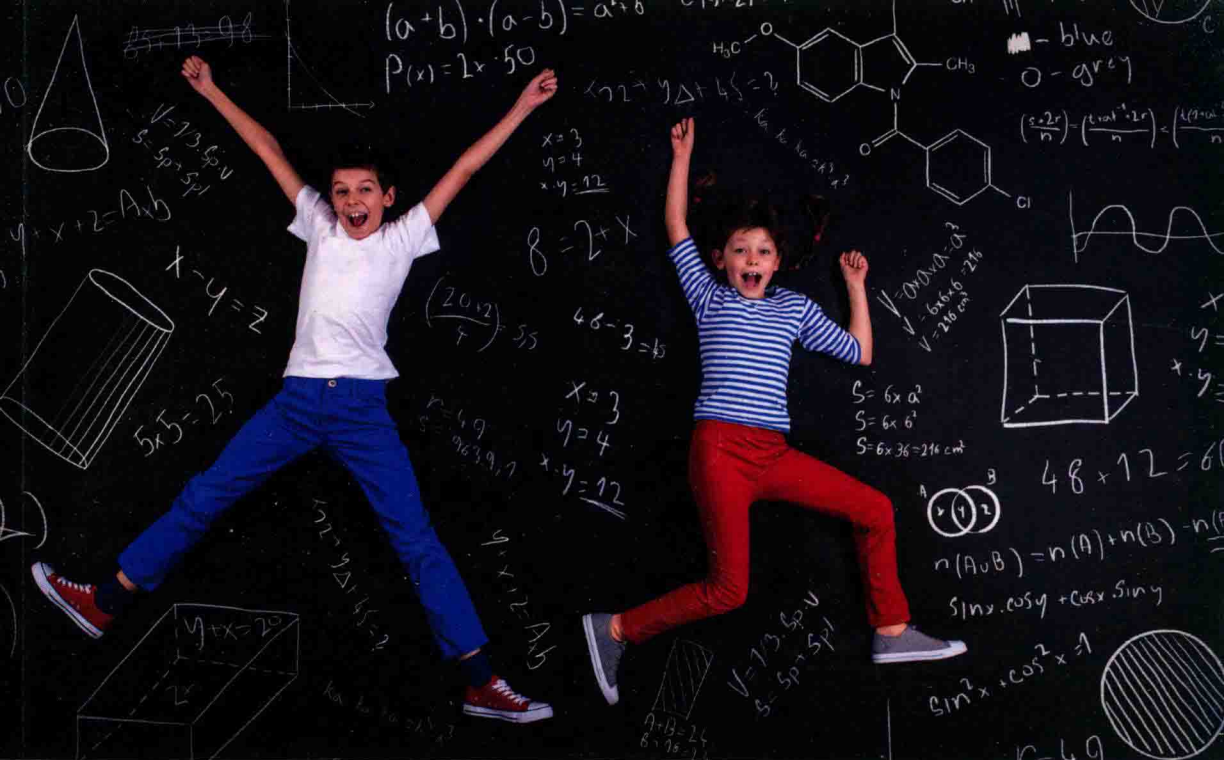




[美]
黄全愈
/ 著

素质教育 在美国

朱永新 | 李希贵 倾情作序

影响中国教育界长达20年
被誉为20世纪中国的《爱弥儿》

新教育研究院、21世纪教育研究院、中华教育改进社推荐阅读

长江出版传媒 |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素质教育 在美国



影响中国教育界长达20年
被誉为20世纪中国的《爱弥儿》

[美]

黄全愈
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素质教育在美国 / (美) 黄全愈著. -- 武汉 : 长江
文艺出版社, 2017.6
(大教育书系. 素质教育在美国系列)
ISBN 978-7-5354-9630-0

I. ①素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素质教育—研究—美国
IV. ①G40—0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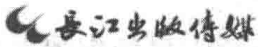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75254 号

责任编辑: 施柳柳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壹 诺

责任印制: 邱 莉 胡丽平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首壹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 毫米×970 毫米 1/16 印张: 19.2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02 千字

定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开篇的话

读着过瘾，但晚上难眠

给美国大四学生上课，如果你问这些“老油条”：“对上课，有啥要求？”

许多人会斜着眼睛答曰：“好玩！”

对付研究生，“有料”就差不多能换来崇敬的眼神。美国大四学生最不好应付，既反叛又自大还忒会维权……得“有趣”“有料”才能和谐相处。其实，他们跟着你“好玩”，也是一种享受。

写作也一样，自己都觉得无聊，不如不写。因此，读者也一定要觉得“好玩”，读起来才有意思。

说得清道理不难，听得懂道理太难……

首先是说得清！让人不懂，太容易，先把自己绕蒙再去蒙人。

上大学时，看过一个电影，总是有着一抹似有似无的淡淡忧伤，而幽默又无处不在。一边咧嘴，一边抹眼泪……

哇，忧幽然，哭笑不得！

我这个人，平日里举轻若重（屁大的事当天大的事）；但写作，我忐忑地想试一试“举重若轻”。

怎样才能把“干货”融进读者的有趣中？怎样才能“润物细无声”地把理论溶解进故事里，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豁然开朗后，又有了莫名的沉重……

2006年，未名湖畔，在“哈哈”声中结束给中小学校长的首场报告。次日，有人说彻夜难眠……找我理论一番。窃喜。

我无力悬壶济世，也不愿做艰深且枯燥的理论说教，更不屑用“心灵鸡汤”代“蒙汗药”；我想把书写得像小说般好看、过瘾，但又在娓娓道来中当头棒喝：“我们是怎样把孩子教傻的”，“可怕的是‘赢在起跑线’的傻跑”……

这里是惶惑的父亲谈孩子的教育，不是教授侃教育理论。

书，一定要读着“好玩”，但光“好玩”会有点弱智，最好夜里又辗转反侧……

这是我惶惶然追求的境界。

然而，答案不在我的书里，在读者心上。

省略就不厚道

原来由各家出版社出单行本，每本书必须叙述完整，但出集子，有些书之间可能会有点儿重复。例如，在分析中国素质教育的盲区时，我在《素质教育在美国》里，引用了“人的行为的两元性和两重性的交叉图解”；在阐述怎么样在“玩”中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时，我在《素质教育在美国3：玩的教育》里，解释了“人的行为的两元性和两重性”的理论。某些重复的部分，要不要删？

当然，最简单的办法是所有的读者都买整套书，我们重新编辑、整理全套书的内容后，把重复的部分删掉。但考虑到许多读者可能不买整套书，而是根据各自的需要买单行本。如果删了有关内容，买单行本的读者就会不知所云。为了叙述的完整及单行本的独立性，也为了阅读的方便，似乎不删更妥些。

我曾想过删除某些重复的部分后注明：请参阅某某书的某某章！妻子摇头：“不厚道！为了一两段文字，逼着读者买另外一本书。”也是哦，厚道有时也会不厚道！

于是，只要不影响行文，能删的就删；不便删的……“真理”嘛，重复一千遍也还是真理！

若干年前针砭时弊，可谓入木三分，但现在看来也可能有点隔靴搔痒，如，专业对口、包分配、5%的自主招生等。

我说：还是还原历史的真实吧。鲁迅的著作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值得质疑的语法问题，如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中的“总之，落水狗的是否该打”等等。

妻子打断我的话：“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，看来还可能真是问题……”

结果，就是适当删改。并不是我想藏拙。敬请读者原谅。

“素质教育”的来龙去脉（代总序）

都是《素质教育在美国》惹的“祸”

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的徐小平在博客中说，他们曾为怎么译“素质教育”颇伤脑筋。其同事张妮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，她的一位教授在中美教育研究中有特殊地位，也为中国教育部的教育改革提供咨询。他的特殊价值是对中国教育的各种词汇的精准翻译，使得美国人能理解那些中国独有的教育词汇，进而理解中国教育。然而，这位教授不知何为“素质教育”，试图把“素质教育”译为“quality education for general public”。这个翻译显然不得要领！徐小平说：“我实在无法理解‘素质教育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

许多中国教育者、家长、学生都曾饶有兴味地问过美国人“素质教育”问题。美国人均一头雾水！这样一来，更惊惑不解的变成国人：美国不是在实施素质教育吗？为何竟然不知素质教育为何物？

恐怕，这都是《素质教育在美国》惹的“祸”。

2010年某日，秘书通知：校长办公室电话，一中国教育局长下午来访……

教育局长，一般访客。我们是州立大学，惊动校长，一定与州里有关。果然，是“友好省（湖北）教育代表团”成员，由当地学区督导（相当于国内教育局长）陪同。

国内访客，要么盲目自大（以为中国基础教育世界第一），要么有点不自信。此客人不卑不亢，不怎么说话……突然问一句：“您怎么看美国的素质教育？”

我一愣，哈哈大笑：“严格地说，美国不用‘素质教育’这个词……”

他打断我：“您说美国没有‘素质教育’？”一边说一边掏公文包。

我说：“这个话题非常有趣！美国有我们所说的‘素质教育’，但不用这个名字。如果你跟美国人提‘素质教育’这个概念，有人也能从字面上去理解它，但许多人可能不知所云。不信，你试问这位学区督导……”

他看看学区督导，给我摊开从公文包里掏出的几张中文报纸：“这不是说的素质教育在美国吗？”

我一看，乐了！这不是2000年我在《中国青年报》的《冰点》（专栏）上发的几个整版文章吗？

同事指着报纸上的照片：“看看，这人是谁？”

他看看我，又看看照片……突然眼睛微微泛光！

我点点头：“岁月是把杀猪刀。”

“素质教育”曾是有名无实的概念。

有人评价：黄全愈的素质教育理念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反对者：绝对言过其实！

支持者：没有黄全愈的系列丛书，国人恐怕根本不理解素质教育为何物！

我：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……

据说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，就有了“素质教育”的提法。但何为“素质教育”？国人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；除了概念还是概念，谁也说不清、道不明。有人说，当时“素质教育”留在人们（包括教育者）脑海

里——仅此四个字眼而已，其余都还滞留在文件的字里行间。2000年，在央视做节目时，北京四中刘长铭副校长跟我说：关于素质教育，当时中国已有54种定义。2001年，台州师范的张教授告诉我：关于素质教育，她已收集了13种译法。

何为素质教育？

有人以为：课后唱唱歌、跳跳舞就是素质教育。

还有教育学院的院长、中小学校长跟我辩论：应试是不是素质？当然，应试教育就是素质教育！

让人啼笑皆非。

鉴于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及改革教育之需要，有人（至于谁？至今是悬案！孙云晓在博客里说，时任教育部长陈至立曾以为是柳斌提出的，但柳先生否认）提出一个与“应试教育”相对应的概念“素质教育”。至于如何改革应试教育？如何实践“素质教育”？还是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

我也“摸着石头”跨洋过海——到美国攻读博士，研究教育理论。

后来，我积近二十年的观察、比较、研究、分析，写了本书《跨文化之教育远足》，内容正是颠覆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，为教育的真谛正名——也恰恰是国人说不清、道不明的所谓“素质教育”；于是，我“洋为中用”地给这本书取了个中国名字《素质教育在美国》。

从此，有名无实的素质教育凸显了直观、生动、可操作、可实施、活灵活现、神形兼备的实质：激发创新、解放个性、尊重人性、鼓励独立、勇于质疑、敢于求异、善于发现、促发科研、学以致用、植根社会、孕育领导、强健体魄……

当时，有人把书送给有关领导。据送书的人说，某部长签了俩字：收到。柳斌先生四个字：颇有启发！

据编辑说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的《冰点》（专栏）发到第二篇《孩子能

不能搞研究》（前一篇《创造性能不能教》，后一篇《孩子毕竟是孩子吗》），教育部一副部长来电话，要了20份报纸。

关于“孩子能不能搞研究”的问题，国人争论不休。华中科技大学一教授义正辞严地坚称：没夯实厚重的基础前，绝不能搞研究……然而，把汉语的“研究生”（大学本科毕业后，到高校或研究机构深造、做研究的学生）意译成英文，美国师生均不知所云：为什么非要等大学毕业后，才能做研究？

那年，人们仍跟我争辩：应试教育好！

我说：考试仅为检测教学的手段之一，但当这个之一的“手段”变成整个教育为之团团转的唯一“目的”，教育的本质是否已被颠倒？

沉默俄顷，听众又群情激奋……

我只好说：建议计生委允许生二胎，一个搞应试教育，一个搞素质教育。20年后，请这两个孩子自己辩论……

想辩及不想辩的人哄堂大笑。

次年，对素质教育人们已将信将疑，逐步消化……基本无人再质疑其真谛。

其实，美国人基本不用“素质教育”这个称谓，是我“张冠李戴”的。也有人说，素质教育从“有名无实”到“名符其实”，是对中国教育改革的贡献。

最近，有人质疑：素质教育没有哲学基础。

国人喜欢名正言顺，啥事都要有个“理”。

若问国人：米卢有无理论？恐怕均大摇其头。米卢的训练，就像美国中小学课堂那样小儿科，毫无章法。13亿人看不清米卢的道道，连他的助手和队员也一头雾水，以为他只会玩、闹，沽名钓誉而已。可悲呀，自“骗子”离去，中国与世界杯越来越远。闹不清怎么输，可怜！弄不明怎么赢，可笑更可悲！

前人曾说：愚钝者对已成功的事还看不明白，睿智者事情还没露苗头已看到结果。不能跟俗人商量创始，只能与他们庆贺成功。

我不敢揣度，米卢从中国既狼狈而去又满载而归时，是否亦此心态？

我也曾以为美国的基础教育没基础，但钻进去二十多年，越研究越深不见底。其实，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即大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。

有趣的是，虽然美国不用“素质教育”这个称谓；但如只给“素质”“教育”这两个单词，不少美国人也能像山寨版“杜威”一样，将教育的本质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……

素质教育的尴尬

有人说，我那本关于“素质教育”的书能成为2000年度非文艺类第一畅销书，是“时势造英雄”；其实是历经沧桑的中华民族，是探索出路的教育改革在强烈地呼唤素质教育。《素质教育在美国》出版时，素质教育已在中国提倡了近二十年，但争来论去，到底什么是素质教育，慢说普罗大众，就是引领教育的厅长、局长、校长们也难说出子丑寅卯。一教育厅长跟我说：“现在提倡素质教育，但忒搞笑的是，反对者在为反对而反对，因为根本找不到着力点；推介者有劲无处使，也是找不到着力点。因为它就是个空洞的口号，没理论、无内容。而我的书正好在这个时候，很直观、生动、理性、深刻、系统地回答了国人的种种困惑……”

写作《素质教育在美国》时，我有两个“设计”：一是以父亲的视角来写素质教育，以便拉近读者的心理距离，使“素质教育”更具亲和力及溶解度。由于我同时又研究教育理论，把理论和多年的困惑和思考揉在一起，再“悄悄地”融入日常的观察和教育实例中，以期“举重若轻”，“润物细无声”地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产生震撼的效果。二是以教师为

主要读者群。这两个“设计”，产生了一个“意外”：家长冒了出来！我无法统计读者中到底家长多还是老师多？但家长的热情似比老师高，至少未发现对拙作咬牙切齿的家长，然而有公开扬言要“砍”我的老师，并且是在南宁——我的故乡。我对转达这个“砍”的家长淡淡一笑：姑且看作君子动口不动手的“侃”吧，不然就真没“素质”了。

接着，我为热情的家长写了《素质教育在美国 5：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》，以一问一答的形式，解答读者林林总总、五花八门的关于“素质教育”的问题……

教育部第 49 道“减负令”如同武侠小说描述的“巨大冲击力消失于无形”——家长不受管，自行加负！《素质教育在美国 3：玩的教育》把“玩”提到素质教育的摇篮的高度！许多读者说：从未意识到“玩”也是一种教育，而且是素质教育……

《素质教育在美国 7：放开孩子的手》出版后，许多读者说：原来“生存教育”几乎可以理解为“素质教育”！难怪说杜威的“教育就是生活”是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。可是，哼哼也好，唧唧也罢，我们挣扎于：没有成绩，过不了今天；只有成绩，过不了明天。在应试教育中生存，还是着眼于未来的社会竞争？当顾头不顾尾的鸵鸟，还是做翱翔于蓝天的雄鹰……

《素质教育在美国 4：智慧孩子是怎么炼成的》出版后，许多读者说：哎呀！天赋教育就是素质教育！但高考把孩子的天赋扼杀得只剩考试能力了……

许多读者在书店拿着《素质教育在美国 6：你也能够上哈佛》翻来翻去，犹豫再三最后又放下了，他们说：看了半天，美国“高考”就是给接受素质教育的“学生”开绿灯，对应试教育的“考生”亮红灯，红灯都亮了，书也别买了……

这些“素质教育”系列丛书，从“创造性能不能教”到“孩子需要

领导素质吗”；从“批判性阅读”到“学习性研究”；从“能不能用左手写字”到“解决问题重要还是发现问题重要”；从“玩，是孩子对世界最大的贡献”到“玩具，是孩子认识世界的工具”；从“在同龄人中学会生存”到“家长参加‘童子军’”；从“三合一（高考+高中成绩+综合素质）录取标准”到“多元文化校园的核裂变”……既涵盖了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等方面的内涵，也外延了“素质教育”的跟踪步履。

2003年12月，潍坊一高中校长在报告会上宣称：“您的素质教育理念已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应试教育！”

全场静悄悄……

我有点忐忑。

现在，已无人再跟我争辩“素质教育”的问题，国人已坦然，甚至欣然接受了“素质教育”。

但高考这个“瓶颈”卡住了素质教育。

《光明日报》2006年11月5日的长篇报道《黄全愈：教育的“修桶匠”》写道：“……在北京地坛公园书市，《你也能够上哈佛》仅售出寥寥数本。散场时，散落在地上的宣传材料随风飞舞，一派萧索。”

不迈过高考这道坎，素质教育与中国渐行渐远……

再来个20年，还是素质教育

我在《南方周末》上发表过一篇文章。说是早在1998年前，斯坦福大学的教育长、大学二把手马林科维奇博士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：亚洲大学（特别提及中国）需要20年才能赶上世界知名大学。

十多年后，2010年在南京举行的“中外大学校长论坛”上，斯坦福大

学校长汉尼斯博士说：“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要20年。”

斯坦福大学的领导们是否患数字“失忆症”？十多年过去了，还说再需要“20年”。更恐怖的是，他还说：慢则50年……

又是一本算了几个“20年”都算不清的糊涂账！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中美两国派教育考察团互访，双方都曾做出同样的预言：“再经过20年的教育，中国的科技将远远把美国甩在后面！”预言的对错，暂且不论。十分有趣的是：这里说的也是20年！

中国人说“三岁看老”，“百年树人”，显然是夸张的文学描述。作为科学论述，为什么斯坦福前后两位领导都以“20年”说事？若然不是信口开河，这“20年”的依据从何而来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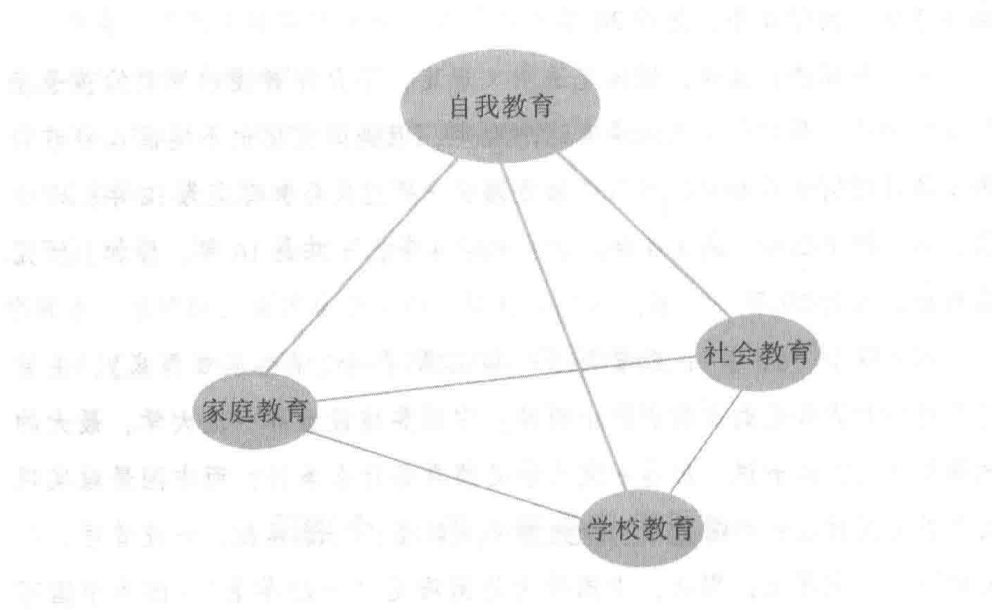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有两种算法：第一种，学前3-4年，再加上小学6年、初中3年、高中3年、大学4年，共约20年。

另一种算法：据说，德国宪法明文规定，不允许教授6岁前的孩子任何学科知识。虽然美国宪法没有这个规定，但美国文化也不提倡6岁前的孩子学习任何学科知识。所以，西方国家一般把义务教育定为12年，即小学6年、初中2年、高中4年。加上大学4年，一共是16年，再加上研究生教育，大致20年。

因为这个“20年”，我曾写了一篇文章《一流学生从哪里来》，主旨是与时任北大校长的许智宏院士商榷：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或者说，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备什么条件？而中国最难实现的条件又是什么？如果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备：一流设施、一流管理、一流师资、一流学生；那么，中国最大的困难是“一流学生”。因为中国可以通过举国体制在财力上向北大清华倾斜若干年，并进行世界范围的“重奖之下出勇夫”的人才招揽，完全可能在十年，甚至更短时间内，实现前三个“一流”。至于“一流学生”，则必须在全国范围内，从K-12（学前教育到基础教育）就开始扎扎实实地推行素质教育，否则北大清华不可能

获得一流生源。没有一流生源，北大清华就是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；根本不可能在4年内培养出一流大学生，进而在短期内培育出一流研究生。换言之，一栋楼能建多高，取决于基础有多牢固，而不是屋顶有多尖。基础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基础，这个基础“搬”不来，必须自己经年累月地去夯实、去奠定。

有人可能会问：既然举国体制可以在短期内实现“前三个一流”，如果我们也用举国体制在100所高中里专门为北大清华培养生源，北大清华能否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大学生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因为，高中生的成长模式已基本定型，此时才开始实施素质教育，已鞭长莫及，难以大器晚成。那么，不选高中，而选K-12的100所完小和完中呢？让我们来分析我的“三脚架理论”：



我认为，教育是四位一体的，包括了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、自我教育。首先是“三点成一面”；然后，在这个面上凸现一个“点”：类似照相机的“三脚架”。因此，我把它叫作“三脚架理论”。

既然是“四位一体”，许多时候“四位”难以截然分开，形成你中有

我、我中有你的关系。由于支撑教育受体的三个“点”是相互渗透、相互作用的；如果只在为北大清华提供生源的100所完小和完中里实施素质教育，但学生们接受的“家庭教育”和“社会教育”是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的应试教育，这种“闭门造车”的结果不言而喻。

前几年，迈阿密大学女足教练曾叫我在中国帮忙招收一两个女足运动员。为此，我还给孙雯打过电话。其实，美国女足的人口达500万，而中国还不到1000人。中国实行举国体制，把少数人集中起来踢球；美国走“群众路线”，到处都是女孩儿踢球。“脱离群众”的中国女足已陷危局。同理，素质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，给北大清华输送一流生源，中国必须从基础着手，花二三十年，彻底改变一代人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，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、创造性、批判思维、质疑精神、探索意识、实践能力……从根本上改变人才的素质。这就是所谓的“最快20年”。换句话说，真的动了基础教育，就是“20年”，否则50年，甚至更长，更久……

2010年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《黄全愈教育文集》，有人质疑：“素质教育”都喊了几十年了，是否换个新提法？许多国人喜新厌旧，“喜”的不是新理念、新思想，而是喜欢换口号、改名字，什么“优质教育”“通识教育”“博雅教育”等等；其实，改来改去，不管换什么名字，归根结蒂，我们所追求的教育本质必须是关于“人”的教育——发掘人的素质，把“人”培养成“人才”的教育。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的“龙象之争”，谁能先崛起于世界，取决于谁能在20年内把“人口大国”变成“人才大国”！形势严峻，中国别无选择，只有推行素质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才素质，才能把“人口压力”变成“人才资源”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只有素质教育能救中国。

有人说：现在是大数据时代，兴“慕课”，讲“走班”……素质教育已无方寸之地。君不见，数据也好，慕课也罢，都是为人服务的工具或形

式。归根到底，人为本！正如拙文《从走课制里“走”出什么》指出的：“走班”就是“解放个性”“重视人性”“培养独立性”！这不都是教育要培养的“素质”吗？

素质教育的起点是人，归宿还是人；因此，“素质教育”是中华民族永恒话题。

中国的“教育复兴”，只能是素质教育

有人主张，中国也像欧洲一样来场“文艺复兴”。所谓“复兴”就是再生。“再”是一而再的“再”，原来有的，才能“再”，才能“复”；原来就没有，怎么“再”？怎么复？当然，这可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。然而，原始的素质教育雏形，中国曾经有过，是可以失而复得、可以再生的。

我们曾经有过最朴实、最本真的“教书育人”的崇高教育目的。孔子根本没给过他的三千子弟或72贤人A-、B+、C或F……可惜，科举制度产生后，“教书育人”的教育本质逐渐被以选拔为目的之科举制度颠覆了。

早在公元前数百年，我们就实施了“有教无类”的招生原则（“10条腊肉”是学费、办学基金）。可惜，“现代科举”——高考的选拔功能，使得各级学校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被划为“重点”和“非重点”，学生也被分进“重点班”或“非重点班”。显然，这种“选拔”和“淘汰”的功能，摧残了义务教育的“有教无类”的平等原则。

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“因材施教”，可以说是古代版的“多元智能”的理论基础。因为人的“智能”是“多元”的，因此施教时要“因材施教”。这不恰恰是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的“施教”根本原则吗？可惜，应试教育使得“因材施教”衍变为因“考”施教的以末为本的教育。

“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”的生动、深邃的教育哲学，曾经惠及无